



诗圣的技艺：杜甫诗歌的创造性及其成就

陈岸峰

摘要：杜甫被尊称为“诗圣”，除了其诗中所体现的忠君爱国、心系天下苍生之外，在其晚年漂泊不定，仍不忘以诗作谏，所言必中，目光犀利。此乃其诗具有史的性质的原因所在。而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以口头语入诗，擅用典故；二是各种体裁，均有创造性突破与开拓；三是在诗史书写方面，注重细节描写，而其仿史书写，则可补正史之阙。此中，其七律的创作，堪称匠心独运，独步千古，《秋兴八首》乃此中典范。此连章组诗，既是诗史，复为诗学技巧创造之巅峰。在结构上循环往复，互相呼应。在其中，杜甫将个体生命与大唐帝国的兴衰紧密结合，可歌可泣。杜甫在技巧艺术与内容的开拓与创造，为时人及后世所不可企及，此乃成就其“诗圣”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杜甫；诗圣；口头语；诗体；诗史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0)01-0114-08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积极入世，投奔唐肃宗行在，获任命为左拾遗，然而他却为战败而被贬谪的宰相房琯陈情而犯颜进谏，几获死罪。自此，杜甫便失意于政治，浪迹江湖，除了短时间在严武幕府谋食而获得短暂安稳外，其他多数时间均漂泊异乡、穷困潦倒。坎坷的经历、政治的失意无形中酿就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对家国的热爱、对君主的忠心、对社会的关心，令其作品充满现实关怀。萧涤非指出：“最后决定杜甫的伟大的业绩的乃是后一期的客观现实。”^{[1]9}即从755年“安史之乱”起至770年止，杜甫创作了大量诗作，并成就其为伟大的诗人。如赵翼《题遗山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2]772}家国不幸成为杜甫忠君爱国而矢志不渝的起点，政治的黑暗、民生的凋敝，则令其诗歌创作有了犹如淬火般的提升。

一、杜甫诗歌语言的创造性

(一)口头语入诗

杜甫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3]810}又曰：“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3]110}故此，他晚年方敢言“晚节渐于诗律细”^{[3]1602}“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3]1515}“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3]1209}。可见，杜甫在诗歌上既自负，却也一丝不苟地进行探索，自我要求极高。杜甫主张“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3]901}，他向屈原、宋玉学习，故曰：“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3]900}他向汉魏乐府民歌学习，故曰：“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3]899}。可见，杜甫博取各家，深入传统，炼句锻章，极其严谨。杜诗内容博大精深，无所不包，他以诗“为民请命”“致君尧舜”，以诗“陶冶性灵”“排闷

收稿日期：2019-03-28

作者简介：陈岸峰，男，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南宁 530006)，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跨学科研究。

遣忧”，以诗书写历史、人物传记，如《八哀》《诸将》等；以诗写奏议，如《北征》等；以诗写寓言，如《萧明府处觅桃栽》等；以诗写自传，如《壮游》《忆昔》等；以诗纪游，如同谷、秦州诸诗。

杜甫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一个关键因素便是其诗歌的创造性。将口语入诗便是其诗创造性之一，例如《兵车行》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3]113}《新安吏》曰：“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3]523-524}《垂老别》曰：“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3]534}《新婚别》曰：“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3]532}口头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杜甫书写民间疾苦及日常生活的诗中，这对宋诗有深刻的影响。

杜甫自言“语不惊人死不休”，即在语言上下极大的苦功。简练是诗歌的关键，杜甫往往只用两句诗来概括复杂丰富的内涵，如“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3]514}。又如“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3]696}，杜甫以简单的两句诗有力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的兵荒马乱，而压缩的内容更堪咀嚼，如“关山月”与“草木风”的对应，“笛声”“山月”“草木”三种意象与兵火之间的突兀所造成的悲哀。《同谷七歌》中的“扁舟”本乃自由纵横江湖的象征，而连接下去的却全是阻碍：“箭满眼”“多旌旗”，故而“扁舟”的对应却是杳杳南国的不可期。

此外，杜诗有时一句写时局，一句写自己，如《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曰：“时危兵革黄尘里，日短江湖白发前。”^{[3]1929}上句说战事势危，下句说漂泊至老。又如《春望》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3]320}上句说国破，下句说家亡；再如《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3]270}上句是饱暖思淫欲，下句是饿殍遍野。这两句诗是天宝年间杜甫在长安的切

身体会，求食无门，到市上买官家低价卖出的劣米，而唐玄宗与杨氏兄妹以至贵族却在曲江畅游，夜夜笙歌。两极的对比，高度的张力，构成了这些诗句的强烈视觉与情感的冲击^①。

(二)用典繁富

杜甫曰“读书破万卷”^{[3]74}“群书万卷常暗诵”^{[3]1830-1831}。黄庭坚评曰：“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4]316}王琪叹曰：“子美博闻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3]2241}沈德潜更指出：“杜少陵经史并用。”^{[5]188}例如《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曰：“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3]1148}乃借用《论语·述而》篇中的“不知老之将至”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如《画鹰》中的“毛血洒平芜”，乃借用班固《两都赋》中“风毛雨血，洒野蔽天”。杜甫用典妥帖自然，语如己出。宋人林希逸指出杜诗用典多变：

事则或专用，或借用，或直用，或翻用，或用其意，不在字语中。于专用之外，又有展用，有倒用，有抽摘渗合而用。（《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30）

清人薛雪在《一瓢诗话》中亦曰：

杜浣花炼字蕴藉，用事天然，若不经意，粗心读之，了不可得，所以独超千古。^{[5]137}

此乃杜甫苦吟之所在，故有后世千家注杜之现象，亦开宋人以学问入诗之风。

二、杜甫诗歌诗体的创造性

为更清楚了解杜甫诗歌的整体创作特征，其主要创作时期不同体裁的作品统计如下表：

(一)五、七言古诗

五言古诗乃“五言自由式”的诗，此体无平仄禁忌，亦不受字数限制，杜诗有长至数百字的，如《北征》。五言古诗的弹性很大，既便于抒情，亦宜写景、叙事。因此，杜甫经常写五言古

时 期	篇 数	诗体								合 计
		五古	七古	五绝	七绝	五律	七律	五排	七排	
入蜀以前	125	49	1	2	154	24	35	1	391	
成都至云安	51	43	15	62	221	54	25	2	473	
夔州以后	87	49	15	43	255	73	67	5	594	
总计	273	141	31	107	630	151	129	8	1458	

诗。杜甫的五古有不少刻画人物之作,如《八哀诗》刻画8位时世英杰,尽管英杰俱为古人,但杜诗之刻画,还是出以赠答笔法,其序曰:“伤时盗贼未息,兴起王公、李公,叹旧怀贤,终于张相国。”^{[3]1373}杜甫命笔之间,多关合自身与之交游的经历感受,例如《赠左仆射郑国严公武》述严武事迹,诗中不仅表达了深挚的知遇之情,而且记述自己入严武幕府的经历,从中写出其人之忠义:

记室得何逊,輜钤延子荆。四郊失壁垒,虚馆开逢迎。堂上指图画,军中吹玉笙。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时观锦水钓,问俗终相并。^{[3]1387-1388}

浦起龙指出:“‘堂上’以下,推明其忧国报主心事,俱从历历亲见处写。”^{[6]149}《赠太子太师汝阳王琿》中亦回忆了自己受知于汝阳王李琿的经历,所谓“晚年务置醴,门引申白宾。道大容无能,永怀侍芳茵”^{[3]1392}。《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则回忆自己受其恩遇,从游历下的经历:

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论文到崔苏,指尽流水逝。^{[3]1400}

至于《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荈阳郑公虔》所写之苏源明、郑虔与杜甫情为莫逆。《八哀诗》正萦绕着“旧游易磨灭,衰谢增酸辛”^{[3]1393}的感伤,其命笔之处,不徒叙故实、道履历,亦所以感怀追昔,记述各故交之立身大节。杜甫的五古生动地体现了其个人遭际与时局之联系所呈现的历史沧桑感。

七古是一种“长句”,可谓“大刀阔斧”,但同时又容许兼用长短句,故此体具有驰骋纵横、发扬蹈厉的条件,最适宜于表现起伏较大的感情,因此亦形成了七言古诗汪洋恣肆、波澜壮阔的特征。杜甫的七言古诗在体裁上的创造性贡献在于:创为9字、10字乃至10字以上的长句。9字句用在结尾处的,如《天育骠骑歌》:“如今岂无騷裹与骅骝,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用在篇中的,如《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炯如一段清冰出万壑,置在迎风露寒之玉壶。”10字以上的诗歌,如《短行歌》:“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

磊落之奇才!”首两句皆长达11字,夺人耳目,气势非凡。此外,杜甫亦有8字句、9字句、10字句及11字句混合用之创造,如《桃竹杖引》:

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见水踊跃学变化为龙。使我不得尔之扶持,灭迹于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风尘濒洞兮豺虎咬人,忽失双杖兮吾将曷从?^②

这些长短不一的句子,不仅加强了诗歌的气势,更是杜甫在诗学形式上的创新。

(二)连章组诗

胡应麟在《诗薮》中指出:“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创。五言则‘行止皆无地’、‘独有宦游人’。排律则‘六位乾坤动’、‘北地寒应苦’。七言则‘季冬除夜’、‘昆陵震泽’,皆极高华雄整。少陵继起,百代楷模,有自来矣。”^{[7]67}此乃杜审言与杜甫祖孙在近体上的开拓与传承。

连章律诗这种新形式的尝试,克服了律诗篇幅短小、容量有限的缺点,在当时是近体诗写作中的一个创造性突破。杜甫对此心领神会,其早期的一些连章律诗可以说是亦步亦趋地摹仿乃祖,例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这组诗其实是摹仿杜审言的《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不同的是,杜甫将组诗由五首扩为十首,增加了组诗的含量,而且杜甫的诗作在严整的结构中有所变化。杜甫后来在连章律诗的写作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形式由五律扩展到七律及五七言绝句,并写出了《秋兴八首》等传诵千古的七律名篇,究其渊源,实出自其祖父杜审言的尝试。当然,杜甫在语言、内容、意象以及技巧等方面,均已远超乃祖,故杜甫曰“诗乃吾家事”^{[3]1477},并非夸张。

(三)排律

在杜甫之前,对五排形式之建立作出较大贡献的诗人首推其祖父杜审言。排律除了首尾两联之外,其余均须对仗,平仄粘对之格律则一如律诗,就格律而言,排律即扩大了律诗,五排即扩大了五律。凡才力不足,学识不够渊博者,均无力驾驭长篇五言排律。

“安史之乱”之前,杜甫作五排17首,自“安史之乱”起到大历元年(776年)迁居夔州之前的11年间作五言排律43首,而在生命的最后5年

间竟作了67首五言排律。一些著名的大篇如《夔州书怀四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等都作于这5年间。及至晚年的杜甫在一叶扁舟上奄奄一息之际，仍奋力写成《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以这首充满悲剧感的排律回顾了自己坎坷的一生。此诗叙述了自己漂泊的一生，重病缠身的痛苦以及爱国忧民的深情。杜甫至死仍忘不了“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3]2096}，家国之忧在他心中萦绕不去。

(四)七律

杜甫对于律诗不只遵循规则，而是有所创造，其“诗律细”的程度甚至超越了格律的要求。

滥觞于梁、陈的七律，虽在初唐及盛唐前期在对仗上日趋精严，但内容的狭小、贫乏却严重地影响了这种新诗体的发展，早期的杜甫亦不例外，及至于乾元元年(758年)的《曲江二首》其一才截然不同：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脣。江上
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
须行乐，何用浮荣绊此身。^{[3]446-447}

蒋金式评曰：“只一落花，连写三句，极反覆层折之妙。接入第四句，魂消欲绝。”^{[8]180}此诗已非应制诗，摆脱了作于乾元初年的《奉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题省中壁》等“应制之体”的束缚，是抒写因伤春而感怀家国之兴衰。

随着杜甫人生阅历的丰富，感慨遂深，其七律离“应制之体”更远。入蜀之后，其七律以书写漂泊的身世与忧国忧民为主，开拓了七律的新境界。此中，政治与历史题材的书写令此诗体跳出宫体的狭小题材空间，杜甫对律诗有以下心得：“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3]110}杜甫的七律常借助逆接、倒插之章法以体现跳掷飞动之势，例如《登楼》首联：“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3]1130}本应是先说“万方多难”再下及“伤客心”，而杜甫如此逆转思维则予读者一种刹那的震撼。

杜甫还善于以七律书写“碧海鲸鱼、摩天巨刃”的场面，例如：“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

变古今。”^{[3]1130}“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3]1484}由天地之大视野，自然界的风云色变，而转入现实批判与历史兴亡的抒情境界。

最能体现杜甫七律巅峰之作的应首推《秋兴八首》，陈继儒评曰：“云霞满空，回翔万状，天风吹海，怒涛飞涌。”^{[3]1499}郝敬则称誉为“力扛九鼎，勇夺三军”“虎视词坛，独步一世”^{[3]1499}。此连章七律组诗的结构与实乃集悲秋传统之大成^③，创造性地为七律作出了突破，为中国诗歌的全面成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故黄生评曰：“杜公七律当以《秋兴》为裘领，乃公一生心神结集之所作也。”^{[3]1485}此连章七律组诗的结构与蕴含的思想及其在七律发展上的地位，正乃杜甫进入个人与大唐帝国总结性的深入省思阶段，堪称其思想之总汇与诗艺之巅峰。

三、“诗史”之誉

杜甫的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及代宗三朝，正与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急剧变化相终始，再加上杜甫的政治参与及见闻，故此他正是大唐兴衰的见证人，其诗史自必征实可信^[9]。

诗与史虽是两种不同的范畴，但自古以来又密不可分。诗歌重抒情性，进入的是心理时空；史重叙事，展示的是自然时空。亚里斯多德如此论述诗与史之别：

显而易见，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0]28}

诗歌重直觉与意象，历史则重实录及因果联系。杜诗能将诗的直觉，投入历史事件与社会情境之中，并将事件与情境转化为审美意象。历史使杜诗沧桑厚实，而杜甫则以诗歌的方式呈现出历史的舞台化。

杜甫对自己的家学渊源，了然于胸，一再引以为豪地宣称“诗吾家事”^{[3]1477}“吾祖诗冠古”^{[3]767}。杜甫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作《祭远祖当阳君文》，祭奠其十三世祖西晋镇南大将军、当阳成侯杜预。杜预有两个绰号：“杜武库”与“《左传》

癖”，前者指其显赫武功，后者指其名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国志》卷十六裴松之注引《杜氏新书》，如此称誉杜预：

大观群典，谓《公羊》、《谷梁》，诡辨之言。又非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横以二传乱之。乃错综微言，着《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至老乃成。尚书郎挚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11]508}

杜甫在祭文中称赞杜预“《春秋》主解，稿隶躬亲”^{[3]2216}，可见他是有意识地传承其祖先的史学精神。晚唐孟棻《本事诗·高逸第三》记载：

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12]25}

“推见至隐”乃杜甫洞察事物的目光如炬与其犀利的政治预感能力，而“毕陈于诗”则乃其以诗写史、关怀时事、悲悯苍生的一片苦心，以上的元素，遂成就其一代“诗史”。北宋初期，真宗便曾亲口称誉杜诗为“诗史”：

真宗问近臣，唐酒价几何？众莫能对，丁谓契曰：“每斗三百文。”帝问何以知之，丁引此诗以对，帝大喜曰：“子美真可谓一代之史。”^④

及至北宋中期，《新唐书·杜甫传》便采用了“诗史”以称誉杜甫的诗歌：“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13]5738}此论一出，回应广泛。在宋人诗话中，称扬杜甫“诗史”，成为同调，陈严肖《庚溪诗话》曰：“杜少陵子美诗，多纪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蔡启《宽夫诗话》亦曰：“子美善叙事，故号‘诗史’。”杜诗之长正是“诗史”之记事抒情，而“诗史”亦正是在杜甫的书写之下，成就卓然，对中国诗歌史影响深远，对唐代历史之书写更有补阙之功。

总括而言，杜甫的诗歌被称为“诗史”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肯定杜甫的叙事诗对有价值时事的保存，记录了唐朝的战争、政局、外交以及社会民生等密切相关的重要历史，例如在《哀王孙》中对“安史之乱”期间王孙贵族仓皇避难

情形的描写；《悲陈陶》对房琯兵败的描写，描述了一日丧师数万的兵败情形。第二，杜甫的诗歌不仅对历史事件进行了记载，还对历史事件发表了自己的评价，这比单纯的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更加重要，后世对于杜诗的格外推崇，主要便因为其“观风俗得失”之作用。第三，杜甫继承了《诗经》的纪实性，同时亦保留了汉乐府诗的情节性与娱乐性，发挥歌行体善于叙事、篇幅自由的特色，结合两种叙事诗体的特点，由此将唐代的诗歌叙事功能推向巅峰。后来，中唐的元稹与白居易不仅继承了杜甫“诗史”的纪实传统，重视诗歌的史学批判与现实性，还增强了诗歌的通俗性与娱乐性，传承、发扬了乐府诗歌的传统，并为叙事诗的选材拓宽了道路。元稹在倡导新乐府运动时曰：

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14]255}

书写乐府歌行而寓意古题，“即事名篇”则在诗题的专门化创新之时，使乐府题旨直接地时事化和现实化，例如杜甫的《丽人行》，多少还是取义于《乐府广题》所引刘向《别录》中的“昔有丽人善雅歌，后因以名曲”^{[15]976}。而《兵车行》《悲陈陶》《悲青阪》《哀江头》《哀王孙》诸篇，则“即事命题”，几为专用，使诗题与时事密切结合，将诗史思维直接具体化，特征如下：

（一）重视细节描写

杜诗在叙述“安史之乱”中一些战事与经历时，特重细节描写，令其诗歌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如《悲陈陶》中写房琯率官军与叛军在陈陶斜一战的情况，在叙及唐军战败、叛军无比猖狂时，便如此写出两唐书所无法亲历的细节：“群胡归来雪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3]314}同样表现叛军得胜后的骄横，杜甫在《悲青阪》中换另一种写法：“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黄头”指黄头室韦，《新唐书》记载：“室韦，契丹

别种。”修辞亦生动形象：“数骑弯弓敢驰突”，具有强烈的画面动感。另如《北征》叙及北归途中回首而望：“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唐诗归》评曰“看景入细入微”；沈德潜《唐诗别裁》则评曰“一幅旅行名画”^{[16]33}。细节，既是写实，亦是深刻体会，更易于打动人心。

杜诗描写细节的延伸方式，乃以人物的对话代替作者的主观叙述，例如《新安吏》除了“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两句，故事其余部分就是“客”与新安吏的对话；《潼关吏》前4句乃行动描写，接下去基本是“我”与潼关吏的对话。《石壕吏》除了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主要故事是老妇对石壕吏的哭诉。《兵车行》主要的篇幅也是对话。通过对话以无添加的方式呈现真实，此乃史书无法企及的第一手资料的生动性所在。杜甫《悲陈陶》对历史事件作如下提炼：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
归来雪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
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3]314}

《资治通鉴》记载的陈陶斜之战：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房
瑄上疏，请自将兵复两京；上许之，加持节、
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
使。瑄请自选参佐，以御史中丞邓景山为
副，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
为参谋。既行，又令兵部尚书王思礼副
之。瑄悉以戎务委李揖、刘秩，二人皆书
生，不闲军旅。瑄谓人曰：“贼曳落河虽多，
安能敌我刘秩！”瑄分为三军：使裨将杨希
文将南军，自宜寿入；刘贵哲将中军，自武
功入；李光进将北军，自奉天入。光进，光
弼之弟也……房瑄以中军、北军为前锋，庚
子，至便桥。辛丑，二军遇贼将安守忠于咸
阳之陈陶斜。瑄效古法，用车战，以牛车二
千乘，马步夹之；贼顺风鼓噪，牛皆震骇。
贼纵火焚之，人畜大乱，官军死伤者四万余
人，存者数千而已。^{[17]2241-2242}

两者叙述的都是安史之乱中房瑄领导的官军与叛军的陈陶斜之战，首先两者都具有这一次战役的基本叙述要素：战役的时间、地点、人物、过程和结果。然而，历史叙述更侧重过程，《资治

通鉴》详细书写了房瑄战前的部署与采取的作战策略，这与历史叙述的目的有关，所谓“史以明鉴”，借鉴的主要是过程，而杜诗叙述更侧重结果，诗中两次出现“血水”意象，而“四万唐军同日死”这句，则更显场面震撼。“见史以鉴”汲取教训，而杜诗则在基本史实之外，更在哀痛方面作出渲染与强调。此外，杜诗中“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则乃司马光所没有的亲身经历，其时杜甫身陷叛军控制的长安城中，这便是杜诗在作为诗史的坚实基础。

（二）仿史书写

杜甫在《北征》中则更直接摹仿史书写法，在开头加上明确的纪年：“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可谓“史笔森严”^{[18]36}。《丽人行》讲述杨国忠及杨氏姐妹骄侈淫逸，通篇叙事，不发议论，而讽意自见。浦起龙评曰：“无一讥刺语，描摹处，语语讥刺。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6]229}施补华在《岷庸说诗》亦评曰：“前半竭力形容杨氏姊妹之游冶淫佚，后半叙国忠之火焰逼人，绝不作一断语！使人于意外得之，此诗之善讽也。”杜甫的《丽人行》又影响了史书，《旧唐书》描述杨氏一家，基本均源自杜甫的《丽人行》：一、五家扈从“着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正是《丽人行》中的“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灿烂芳馥于路”，正是《丽人行》中的“头上何所有？翠为匀叶重鬓唇”；“国忠私于虢国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联镳方驾，不施帷幔”，正是《丽人行》中所讽刺的“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每三朝庆贺，五鼓待漏，靓妆盈巷，蜡炬如昼”，正是《丽人行》中所描绘的“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19]2179-2180 [3]156-160}。除此之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与《北征》，同样亦是诗歌与史笔的结合之细节描写之杰构。

（三）补史之阙

离世前二年，杜甫由荆楚南下湘衡，次岳州作《岁晏行》：

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

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太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铁和青铜。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3]1943-1944}

此诗从岁暮白雪洞庭、渔夫罢网、徭民射雁,即景起笔,书写民间疾苦。诗中的“去年米贵阙军食”中的“去年”即大历二年,《旧唐书·代宗本纪》记载该年秋,“河东、河南、淮南、浙江东西、福建等道五十州奏水灾”;十月,“减京官职田三分之一,给军粮”;十一月,“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钱以助军”^{[19]287-288}。究其原因,半是天灾,半是兵乱。今年丰收,却出现米贱伤农的严重现象,原因在于朝廷不察民情。“高马达官厌酒肉”,而百姓家中却空空如也,穷苦农民为了缴纳租庸官赋,已经到处卖儿女。杜甫上承“徭民射雁”的意象以作比兴,借用楚人好鱼肉不好鸟肉,劝告不要枉杀哀鸣南飞的鸿雁,不要赋敛残民。此诗对现实黑暗的揭露,打破了官修正史对此弊政的忌讳:“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铁和青铜。”揭露了钱币制度的官样文章掩盖下的腐败实质,仇兆鳌评曰:“此慨当时钱法之坏。民穷财尽,故恶钱滥用。”^{[3]1944}其实,此现象自玄宗天宝年间已出现:

天宝数载之后,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之南,每钱货得私铸恶者五文,假托官钱,将入京,私用鹅眼铁锡古文纒纒之类,每贯重不过三四觔。^{[3]1944}

《续通典》卷十一引正史材料曰:

唐肃宗上元元年,诏曰: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经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逾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况物价益起,人心不安。事藉变通,期于折衷……(代宗)宝应元年,改行乾元钱一以当三,乾元重棱小钱亦以一当二,重棱大钱一以当三。寻又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其私铸重棱大钱,不在行用之限,人甚便之。其后破钱铸器,不复出矣。^{[17]2269}

按以上记载,捉拿私铸,整顿币制,腐败已绝,然而从杜诗的揭露,方知这一切皆为虚言。官方允许铅铁与青铜混合铸钱,刻泥为模,浇铸方便,好钱、恶钱不等价,基本是公然的掠夺天下财富^[20]。此外,在“安史之乱”以前,唐朝就已实行强迫征兵,就如杜甫《兵车行》所写的一样,征召的只是壮丁,而不至于妇女及老弱儿童。及至“安史之乱”之后,召征惨不忍睹,尽在杜甫笔下,杜甫《羌村》之三曰:“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3]394}《新安吏》亦曰:“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3]523}此际壮丁已没有了,“中男”与“儿童”均被赶驱上了战场;又在《垂老别》中曰:“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3]534}就连“行将就木”的老头亦不能幸免。更悲惨的是连老太婆也抓,《石壕吏》中曰:“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3]529}百姓不止受“胡兵”的屠杀奸淫,如《述怀》所曰:“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3]359}“官军”同样也胡作非为,如《三绝句》之三所曰:“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见在官军中。”^{[3]1341}如此惨况,对于享受近数十年太平的大唐百姓而言,如堕地狱。这一切都是“正史”所不曾书写的丑恶事实。

结 语

杜甫曾在肃宗行在任左拾遗,却因谏而断丧政治前途,任期虽短暂,而其此后泛舟江湖,飘泊万里,落魄以终,却始终不忘朝廷。虽处江湖之远,而其在诗中继续以谏谏意识建言划策,针砭时弊。他虽也曾汲汲于求官,亦为一蹶不振而耿耿于怀,然而其胸襟博大,自始至终心系天下,故此萧涤非评曰:

自宋以来,大家一致公认杜甫的诗是诗史,这是非常确当的称号。因为他利用他的诗笔画出了一系列的广大人民的生活图画,有时是泼墨,有时是工笔。这些图画,不是片断的,而是连续的;也不是局部的,而是具有全民性、全国性的。^{[1]61}

正是“安史之乱”所引发的国家灾难与社会动荡,杜甫由此获得书写的重心,其关心政治、悲悯苍生的主体性介入,并在诗歌的题材和体裁方面,戮力创拓,其在语言、用典及体裁的创造性以及诗史书写的客观性上,均达到前所未有的

的高度。此中尤以连章组诗最具独创性,《秋兴八首》可谓其集大成之作,既在格律上苦心孤诣,又在诗中回顾了自己的生平,省思了李唐政权的兴衰,堪称千古绝唱。简而言之,以上诸元素的结合,成就了杜甫“诗圣”之名。

注释

①有关杜诗炼字方面的论述,可参见萧涤非:《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9-90页。②明末清初吴梅村的《通玄老人龙腹竹歌》,应该便是受杜甫《桃竹杖引》的启发而又有所创造。见吴伟业著、李学颖标校:《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289页。相关论述可参阅陈岸峰:《甲申诗史:吴梅村书写的一六四四》,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9-83页。③宇文所安指出:“在这些秋天世界及其意义的复杂感怀中,夔州诗的丰硕成果达到了高峰。”参见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盛唐诗》,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42页。④杜甫在《逼侧行赠毕四曜》中曰:“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仇兆鳌:《杜诗详注》,第468页。

参考文献

[1]萧涤非.杜甫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
[2]赵翼,著.李学颖,曹光甫,点校.鸥北集[M].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1997.

- [3]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叶燮,薛雪,沈德潜,著.原诗·一瓢诗话·说诗碎语[M].霍松林,杜维沫,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6]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
[7]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郑庆笃.杜诗“诗史之誉”[J].杜甫研究学刊,1990(4):
[10]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4]元稹.元稹集[M].冀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15]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香港:中华书局,1977.
[17]司马光.资治通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18]黄彻.巩溪诗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9]刘昉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0]王怡辰.中晚唐河北三镇交易的媒介[J].通识研究集刊,2005(8):17-36.

The Arts and Technique of the Poetic Sage : the Creativity and Achievement of Du Fu's Poetry

Chen Anfeng

Abstract: Du Fu was praised as “the Poetic Sage”, with the exception to his loyalty to the Emperor and his love and concern to the people, he still concerned criticized 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ment during the wandering of his remaining years. His political prophecy in his poetry was always critical but true. This is why his poetry was regarded as poetic history. His creativ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including these aspects: Firstly, he used spoken words and was good at using allusions. Secondly, he had breakthrough in different kinds of genres. Thirdly, his writing of poetic history particular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detail description, while the imi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writing was a compensation to the insufficient resources of the official history. In all his poetry, the exploration of writing seven-syllable completely demonstrated his ingenuity and creativity, *Qiu Xing Ba Shou* was the model, which was poetic history, but also the peak of poetic creativity. Structurally, this poetry moves in circles and echoes to each other. Du Fu closely connected his personal life with Tang Dynasty, which was full of tragic and touching tears. In short, the technique and content of Du Fu poetry actually demonstrated his exploration and creativity, that were the essential causes for his unprecedented glory.

Key words: Du Fu; poet-sage; spoken words; poetic type; poetic history

[责任编辑/周舟]